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乱世中的信任

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

【美】史瀚波著 池桢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乱世中的信任

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

【美】史瀚波著 池桢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
社会关系/(美)史瀚波著;池桢译.—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6.2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6-4512-1

I. ①乱… II. ①史… ②池… III. ①地方史-研究-
天津市-民国 IV. ①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2149 号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乱世中的信任

——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

(美)史瀚波著,池桢译

责任编辑/王成伟 封面设计/姜 明 版式设计/杨钟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1 字数 210 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512-1/D·130

图字 09-2013-762 号

定价:4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致 谢

很多人都值得我向其致谢；因为正是他们所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才让这本著作成为可能。作为本书据之为基础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者，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给予我持续不断的支持；这其中，她既给了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指导，也赋予我会心一笑的能力。当然，我的事情不恰当地占用了她宝贵的时间。针对我所使用的材料的偏颇及局限性，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给我以灵感，并做了老到的审查。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推动我把理论建构带入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话语之王国中去。戴安妮·林德斯特罗姆(Diane Lindstrom)阅读了不同的草稿，也给予一些我所需要的建议；凭借这些建议，我成功地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其他的同事和朋友也阅读了草稿或者草稿的一部分，他们是：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玛丽·巴克(Mary Buck)、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安德雷·迈克埃尔德利(Andrea McElderry)、茱莉亚·托马斯(Julia Thomas)、同差·威尼恰库(Thongchai Winichakul)以及乔纳森·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两位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以及我的编辑们——凯思琳·迈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阿曼达·海勒(Amanda Heller)——也都仔细阅读了书稿。他们努力之结果就是

一本得到很大完善的著作。和卞白眉的两位孙女——梅爱琳(Elaine Mei, 音译)、卞克莱(Claire Bien, 音译)——的相识,进一步提醒我去注意那些仅仅从文献中获知的“演员”们身上的人性之维。卞克莱大方地让我使用其家族的信件和照片。

来自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的资助让我赴华研究成为可能。我在伯克利的学习以及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及耶鲁大学神学院查阅手稿,也都部分地得到了来自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院及中国研究中心的资金支持。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一年的资助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的梅隆基金。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研究生院的补助金,让我在1999年和2000年的夏天前往中国,从事更多的档案查询工作。

如果没有天津社会科学院行政和科研人员的帮助,我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是无法完成的。王辉院长大方好客;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董惠凡(音译)——大大简化了一个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所要面临的繁琐程序。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不吝分享他们的时间与经验。罗澍伟、胡光明对我照顾有加,给了我所需要的建议和指导;张利民、刘海岩给了我学术上的启发激励和相伴相随。最为重要的是,宋美云女士贡献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让我的研究成为可能;她在一个外国人的要求和小癖好上面,也花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我向天津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总是那么友善、乐于助人;对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天津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方兆麟同我分享了他有关天津历史的知识,也提供了我最需要的帮助。在中美两国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

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Butler)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是布朗大学的玛莎·米肖(Martha Mitchell),都给了我热情且专业的帮助。

书中的一些部分利用了之前刊登在《地方主义的持续与限度:天津的纸币与国家势力(1916—1937)》¹以及《军阀、干部与银行家:民国及后毛泽东时期的私人商业银行》²中的资料。谢谢这些刊物的编辑允许我在拙著中使用这些资料。

我亏欠我的朋友和家庭太多了:他们在不太能够懂得我为什么会放弃在银行的成功事业转而治学的时候,仍旧对我表示支持。谢谢你们——琳达、凯茜还有劳丽,是你们劝说我离开工作,回到研究生院来。我应该感谢妈妈谢琳(Shirleen)和父亲钮威廉(William Neu),因为他们教导我:吾当心存高远,信心满怀。在那个关键的时期,谢利、乔治还有雅克利西斯给了我一方居所,给了我情感上的支持。在1997年,是我的岳父母——蒋锡龄、张佩文——让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长达数月的写作中去。我在伯克利的许多同学给了我友谊和学术激励,特别感谢达伦·祖克(Darren Zook)、兰加纳·阿利亚拉南(Ranjana Ariaratnam)以及我的博士论文团中的其他成员——马克·哈尔珀林(Mark Halperin)、乔希·霍华德(Josh Howard)和玛德琳·许(Madeline Hsu)。最后,我想说:我无以偿还我的妻子蒋逸瑜给我的挚爱、情谊和理解,因为我根本不值得拥有这些。

有这样一个充满智慧、严格要求的师长、读者、同侪、家庭和朋友之群体,夫复何求?没有他们,这部作为结果的著作如何能得以完成?当然,书中之舛错,皆由我负责。

注释

1 见史瀚波(Brett Sheehan):《地方主义的持续与限度:天津的纸币与国家势力(1916—1937)》,收入《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1131—1186页。

2 史瀚波(Brett Sheehan):《军阀、干部与银行家:民国及后毛泽东时期的私人商业银行》(Warlords, Cadres, and Bankers: Private Commercial Banking in the Republican and Post-Mao Periods),《亚洲商业杂志》(*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第14卷,1998年第1期,第5—22页。

对币值的一点说明

中国货币体系之成分的价值时时处处在变化；即便如此，一些大体上的归纳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如下：

1 元=0.667 两(1 两=1.5 元)

1 元=0.40 美元(1927 年前后)

1 元=0.35 美元(1930 年前后)

1 元=0.20—0.25 美元(1933 年)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天津，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月收入是 14—20 元，银行职员每月可挣得 40—80 元，而像卞白眉这样的银行经理的月薪则高达数百元。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乱世中的信任》问世十年来,本书的核心议题“对货币银行体系的信任及其自身的稳定性”依然处在现代经济、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最新的一起例子罢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后,形形色色的银行家、官员和政客乱作一团,在究竟采用何种手段方才合适的喋喋不休中,试图力挽狂澜,重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城里的军阀、银行主还有政客以及地方精英,与之何其相像!每个人都同意拿出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方案的性质当如何,谁又该对其负责,大家莫衷一是。最终,民国时期的天津和2008年的世界都端出了“一锅杂烩”:其中既有国家干预,也有机构改革的尝试。实际上,在民国天津以及今日世界,手头事件的绝对重要性有利于让国家在重建信任中发挥作用。因为,商业精英群体根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为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埋单。

或许,我们不必急于对中华民国作出判断。诚然,军阀政府对资源的需求经常会引发金融危机或者对危机有所“贡献”;但是,这种“麻烦”并非金融业发展成长中的唯一元素。虽然民国经常被看做一个失败的时期而遭人嗤之以鼻,但在货币和银行体系方面,民

国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增长得以实现的时期。我的意思是：金融机构的性质以及对信任的需要，为这种增长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时期，从修造让人印象深刻的银行大楼，到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以让针对贪婪成性的军阀的借款变得合理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都被启用了，目的就是让银行以及银行发行的货币逐渐取得人们的信任。整体的趋势是：在全国范围内，国家对甚至包括地方在内的货币和银行业施加更大的影响，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考虑到这一趋势，确保非个人性信任的手段被成功地创造出来，这会是对政府权力及生存能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面对信任之需求，政府也变得愈发脆弱。结果，一场金融危机会导致国家合法性的危机而收场。信任、货币、银行以及国家，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针对金融危机历史个案的研究，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眼前的种种现象。

最突出的一点在于：研究 20 世纪早期天津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一种迷人的似是而非。一方面，金融体系有着危险的脆弱性，危机产生了实实在在（有时还是灾难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又展现了让人感到惊讶的弹力和活性。虽然商人和政客在东拼西凑有效的策略，非个人性信任的终止看起来只是暂时性的，是可逆的。信任，无论它身处乱世与否，都是坚挺的；即便是面对最混乱不堪的政策，它都能加以应对。虽然清楚明白的监管和透明机制有助于防止危机的发生，但即便是没有它们，我依然乐观地认为：固然危机犹酣，商业精英和政府依旧有能力“蒙混过关”。

我要感谢一些人，是他们让中文版《乱世中的信任》成为可能。首先就是熊月之先生，没有他，也就没有此书；还有就是高俊先生和余岚女士，他们提供了无价的指导和帮助；当然还有池桢

博士,他为本书的翻译用力至深;最后,我还要谢谢从中联络的王路曼博士,她是我的模范学生,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更是一名严谨的学者。

史瀚波(Brett Sheehan)

2013年5月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天园一畔

目录

致谢

对币值的一点说明

中文版序言

导论	1
第一章 个人网络与国家需求	31
第二章 天津 1916：暂停兑换	69
第三章 地方监管机构、纸老虎和好公民	105
第四章 军阀政府的游戏规则	135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统治和新环境	166
第六章 国际危机时期的信任	199
结论	232
附录	246
附录 A：天津现代银行的货币流通	246
附录 B：设在天津的各银行中外文名称	247
附录 C：《钱荒白话歌》	248
附录 D：1927 年天津中国银行为政府提供的贷款	250
参考文献	251

导 论

1937年12月23日,天津中国银行的经理卞白眉惴惴不安地登上前往北平的列车。日本军队已在7月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战事变得愈发糟糕起来。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撤退,向着远在大西南的重庆奔去。在华北,日军策划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将以北平为基地,雇佣之前的中国官员。其中的一位官员王克敏已经电召卞白眉前来会晤,商议组建一家新的中央银行,以之代表傀儡政府发行货币。在驰往北平的两个小时的旅途中,卞白眉坐在那里,心中却在忧虑:如何才能避免傀儡政府染指他的银行所拥有的大量资源?这样的忧虑,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保卫着对中国现代银行的信任及其机构的完整性;这期间,银行经历了七场内战和至少九起金融危机的打击。卞白眉的银行事业开始于更早的、二十五年前的一场北平之旅。当时,年轻的卞白眉(生于1884年)来到北平,希望在紧随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而来的新共和国的让人兴奋的岁月里,扬名立万。拥有布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学位,拥有出身最显赫中国精英家庭的血统,胸怀壮志的卞白眉利用其负笈海外的经历及家族的人脉,在新生的中国现代银行业中谋得一份差事。作为一个刚刚完成美国教育的年轻人,他未能设想随后岁月中不得不去面对的痛事和苦难;他也不曾想到:伴随着1937年岁尾奔赴北平与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会晤的那一命中注定的旅程,一切都灰飞烟灭。卞白眉曾经说:那时候,我的灵魂,死掉了。

从 1916 年到 1936 年间努力发展出可行性策略,据之提高对银行的信任,以及卞白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一道构成了拙著的中心叙事。总览卞白眉事业的全过程,与国家、公民的经济福祉密不可分的是: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持续可行的运作,以及公众对二者的信任。¹北方城市天津(卞白眉家之所在、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在这里提供了叙事的地方脉络。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卞白眉担任中国银行(中国所拥有的规模最大的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同时也是强有力的天津银行公会的主席。卞氏作为天津银行家之翘楚,令其自然成为研究之对象。不仅如此,他留下了一部关于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经历的翔实的日记;它是本项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日记中记录的卞白眉的思想与反应提醒我们:在有关团体、机构和模式的讨论中,那些由抽象的分析范畴描述的现象,来自于个体的复杂且经常是矛盾的行为。在卞白眉的日记之外,天津还有丰富,但大多尚未被利用的民国史料,这其中包括:天津银行公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以及天津最重要的几家银行的档案。1994 年和 1995 年,当我在天津的时候,通过拜访一定数量的、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银行中就职的男性(当时罕有女性在中国的银行工作),我为这些文字记录做了些增补。

民国时期,中国有着绵延不断的政治危机,这一点早已为人熟知。经常性的内战和持续性的政治动荡迫使银行家跟一连串的军阀、政客还有政治运动打交道,这些人对金融体系都有着自己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涉、威胁甚至军事攻击,制造出连绵不断的软弱感。实际上,针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信任提出挑战的,并非只有政治危机。金融危机(迄今对其少有研究)赫然出现,既对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也对公共想

象中的银行形象构成了挑战。天津的一位居民仍旧记得：有一天他去自己的小学交学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不好用了，因为一场挤兑让发币行关门大吉。²在银行经理当中流传的亦真亦假的故事，也显示出银行挤兑的重要性。一位曾经的银行经理回忆起一位老同事的事儿：某家银行在挤兑期间，让自己的员工扮作客户，排队以钱换银。然后，这些“心满意足的客户”从后门偷偷溜回银行，把刚刚兑换的钱再换回来。他们反复不停地这样做，主要就是用相同的纸币兑换相同的银两，这样即可确保银行的现银准备不少一分一厘。真正的客户对这种不加限制的兑换能力印象颇深，所以挤兑风潮很快就平息了。³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银行经理散播关于自家银行的谣言，他希望藉此表明：自家银行在随之而来的挤兑中能够存活下来，这象征着该行是牢固可靠的。⁴银行挤兑亦成为小说的素材。在曹禺 1936 年创作的《日出》一剧中，一个阿飞通过描述挤兑来威胁一名银行经理。他这么说道：

明天早上我要亲眼看着你的行里要挤兑，我亲眼看着付不出款来，我还亲眼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也瞧不起你，侮辱你，挖苦你，骂你，咒你，——哦，他们要宰了你，吃了你呀！你害了他们！你害了他们！他们要剥你的皮，要挖你的眼睛！你现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对得起他们……⁵

遭到质问的银行经理给这个流氓提供了可疑的贷款；后者非但不还钱，还威胁这名经理——他用的不是枪而是随着银行失去人们对之的信任而来的恐惧：感到上当受骗的公众“要剥你的皮，要挖你的眼睛”。“剥皮”“挖眼”是夸大其词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位银行经

理在挤兑期间遭到过人身攻击；但，人潮是真实的。曹禺的夸张手法说明了信任，以及金融危机当中这种信任的暂缺对银行家职业生涯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的重要性。

从1916年到1937年，至少有九起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天津。前七次以银行挤兑的形式出现，在其中：人们聚集在柜台，把纸币换为现银，并且以银、铜元提走存款。⁶第八场危机是日本于1932年攻打上海的结果，战争切断了天津银行与上海银行间的紧密联系。最终，随着在国际收支危机中，美国的购买吸走了巨量的贵重金属，1934—1935年的天津乃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白银短缺的问题。⁷

关于金融危机的本质以及缓解措施，几乎没有达成共识。⁸不过，拙著所讨论的九场经济危机共享一种特性：货币（特别是银行发行的纸币）之制造、管理、流通和监护（维持）出现了混乱。考虑到货币在拙著所研究的历史过程中的中心性，这里有必要对货币的性质及其与信任的关系稍加评论。

为克服那些对货币的处理方法——它们主要根据货币的功能（支付手段、价值标准等）或者形式（实物货币、纸币等）来看待货币，拙著广泛汲取了诸如吉奥格·西摩尔（Georg Simmel）、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亨利·丹宁·麦克里奥德（Henry Dunning Macleod）等学者的理论。就货币的全部形式和功能而言，它就是债务。⁹货币经济的功能不同于物物交换经济；使用货币的能力不仅能够像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促进交换，它更承认了本质上不同的交换类型。正如西摩尔所言，物物交换不过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货币则引入了第三方：“双方互动的关键点从二者的直接接触中退出，转向双方都拥有的、与接受货币的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关

系……[这]不过是对社会的一项要求。”¹⁰所以,据 19 世纪经济思想家亨利·丹宁·麦克里奥德:“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经济的信誉,亦即取决于社会成员履行那些旨在交换单位货币之服务的意愿和能力。”¹¹所有货币都取决于这样的信任: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某些社会成员接受货币符号,以之交换物品或者服务。

两个其他因素对理解货币中的信任也是必要的。首先,货币不是特立独行的,而是被社会性地产生出来。¹²在有些情况中,如贝币(cowries shells),货币的制造很分散;但多数情况下,货币是由专门的组织,如国家,在民国那里是银行生产和管理的。再者,货币是在使用者的网络和回路中流通的。¹³通过指定两种有关的信任关系,这两个关注货币的制造者与使用者的因素让针对信任的考察成为可能。一方面,货币依赖对制造者(以及潜在的,对货币管理者)的信任;另一方面,货币也取决于对使用者网络的信任。这两种关系和那种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是一致的;这种非私人信任诞生自这样的情况:“社会控制手段源起社会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直接接触无法实现;匿名的、做好交换准备的个人或组织的代理人代表委托人行使巨大的、被授予的权力,而委托人既不能制定、审查、评估也不能限制他们行使权力。”¹⁴如此的一笔交易取决于对某一个体群的信任;这个群中的个人并没有参与最初的交易,他们也不必为最初的交易者所知。像诸如银行或政府之类组织所发行的货币依赖于对这些组织的非私人信任;同样,它也取决于这样一种信任——社会整体乐意接受这些组织制造出来的代币(token)。在两种情况中,信任绝不依赖人际关系。一个人会依靠针对某个体的个人信任,以保证支票不会被拒付,硬币不会被改换,或者纸币不会被伪造。不管怎样(通过个人的信任,要求银行去核对准备、称量,或者其他检验手段),代币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但